

赵 俪 生 著

篱 槿 堂 自 叙

余系旧家族之飘零子弟。破落中
冲破数理、外语、创作、翻译等大关。
的阵地里。于哲学亦常染指。

余自幼即不满贫富、贵贱差别
追随革命道路。但碍于局限，一直不
个终生的革命同路人。于此无怨无

余小有才华，故能获致老辈人、同辈
人，因之于学术界不无知闻。届毫耄后，每将逸事写为篇章。

余终生不吸烟，中晚年亦断饮酒，惟嗜茶八十年如一日。素不锻炼，
亦拒不检查身体。非万不得已，不进医院。现已八十有三。与妻相伴，亦
已六十二年。



养出来抗争与毅力。
最终落户在历史学

很大的社会，故及早
是核心人物，成为一
悔。

人，晚辈人之奖掖与爱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赵俪生 著



赵俪生自叙

(我的回忆录)

赵俪生自署好手
八十有二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编者的话

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文化”更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注视与思索。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六七十年代那场浩劫,则唤作“文化大革命”;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曾经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等词汇渐已淡出,而“文化”则成为各行各业都想攀附的一种“热点”,似乎不如此,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律。本世纪对“文化”的这种重视,无论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也无论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都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晚来的自觉:文化问题是一切社会变迁的风信仪,而一切社会变迁,最终又必以文化的更新为鹄的。于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文化人,他们的历史命运、行迹心路,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问题。

虽然文化人——在古代称作士,历来处于“当路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历史演进中尤其敏感而又活跃的一群,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与思想发展滞缓,他们的路向与心境倒一直比较的单纯。至少从企望为“王者师”的孟子起,他们骨子里总是以先知先觉自居,而当路者与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于是抱着至少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他们可以主要从书本中讨生活,以半是历史,半是心想的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俯瞰着世俗的生活与王权,等待着当路者延为“帝师”,并

FV18/07

进而圆遂其治国济民的种种蓝图,尽管这蓝图往往被前者视为迂阔,而又为后者所漠视。犹疑与困惑也是有的,但除了忠奸真伪一类非士人独有的普遍性矛盾外,主要只是徘徊于出处之间与终极一致的学派归趋上,至于带有文化更新意义的困扰,即使有,也只是至晚明以后方以萌芽状态出现,且尚不具备动摇根本的性质。于是后来被称作“人文精神”的那种知识者的终极理念,那种不可或违的操守与对理想的九死不悔的追求,因其现实内涵的明晰,得以成功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相对平和的心境;对于所谓“虚静”的不渝强调,多少有着这种历史情境的反映。

然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他们骤然震荡。一切因袭的心理矛盾,由原来偏重于谐和而趋向于尖锐对立。从学与从政,过去由“学而优则仕”相统一,现在因着专业的细化与民族的危亡,变得往往不可得兼;而在这两个层面上,过去虽有新学与旧学,新政与旧政之争,有时也形同水火,但因为归趣其实一致,即有去从,亦不妨大节,有所反复,也无伤根本。然而现在,一切新与旧的较量,却往往有了本质意义的对立。即使有幸而仍专注于学术文化的揣摩研创,但面临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面临他们曾倚以为生的旧文化传统的基础动摇,书斋生活也再不平静,从新从旧抑或新旧合璧的抉择,已关乎民族文化的何去何从;而一旦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社会活动,从新或者从旧,也不再仅是个人进退与对一姓国家的是否忠诚,它已直接关乎亿万兆众之民族的能否生存。而这一切又都使他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选择,对那曾视以为生命的一贯的节操、信念等等,究竟是应当顺应还是反叛:是幡然觉醒,成为旧世界的挑战者;还是身心分离,在感受甚至祈向着新生的同时,却无可奈何地随着旧势力的沉沦而沉沦。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抉择痛苦,还不尽于此。由于道统观念的实际破灭,他们失去了用以傲视现实的思想依凭,却也因此有可能更脚踏实地,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当路者与民众之交接点的职能。但是转型时期必有的种种扑朔迷离,使原本幼稚的他们常常感到前路茫茫,欲归何之:新与旧的界限并非泾渭判然,新旧之间的得失是非也非斧斫般分明。作为终极理念的“人文精神”,至此已往往因失却安放的基础而变得难以依凭。即使一旦认清了确实先进的新思想新领袖,而甘当追随左右的“革命军中马前卒”,并为他们所深深宝爱的民众沥血疆场,但由于前者在当时同样的幼稚,他们往往被拒之门外,或者进了门又被扫地出门;又由于民众思想对于精英思想的必然滞后,他们如火如荼的热忱,又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望天呼吁,在当时已成为这身处于动荡时代而尚欠成熟的一群之普遍心声,在这种真诚悲壮的呼吁中,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竟有了具体而微的缩影;而今天当我们返观他们的行迹心路时,也不必为其每多徬徨,时有摇摆而纳闷,因为除了少数的野心家、权谋家以及徇一己私利的叛徒走狗外,这徬徨、摇摆,正是蝉蜕鱼化时期那苦闷的象征。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上述特殊地位的认识,在当今政治家、实业家的传记热中,我们设计了这一套有关文化人的回忆录丛书。

这是一套并非历史书的历史书,虽然它未有史乘的涵盖性与理论体系,但真诚的追忆所展开的生动细节,必将促使我们去思考史乘所叙述的“然”背后的“所以然”,或者这“然”是否确实“然”,从而引发我们对现有种种史学构架的审视与修正。

这又是一套并非知识读物的知识读物,由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文化人所展开的,远比其先辈广阔的社会生活网络,将使读

者对这个部分身历而即将逝去的世纪,油然而起方方面面的真切回忆,并进而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种种后果前因。

自然,它们也并非小说书,但真诚与素朴永远是美文的底蕴,而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与理致,又使这套丛书,在细节的发现与心理的开掘上,更为灵动而精彩纷呈。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在完成了自己当行本色的学术文化之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同时,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本世纪社会形态的同样巨大而艰难的转型,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而贯穿其中的文化人与当路者以及民众的历史性矛盾,又是否能给今天某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所谓“人文精神”应当如何来理解或者更新?在“造福民众”既因基本利益一致而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时,当政的文化人与在野的文化人,又如何才能更多一些相互的理解?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时,我们每一个人又应当抛弃些什么,坚持并发扬些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在审读着案头那一部部文稿时,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于是,想到了一个似乎尘埋既久的名词——白屋。白屋为贫者所居,又衍而为“白屋之士”,肩负民族振兴伟业的文化人——无论是当政的还是野的,是否应当常记这与民众血肉相联的白屋呢?因取以为丛书名。

赵昌平

1999.8



1979年摄于少林寺

目 录

篱槿堂自叙	(1)
第一章 乡土和身世	(1)
第一节 乡土 第二节 身世	
第二章 小学和初中	(10)
第三节 小学 第四节 初中	
第三章 高中阶段	(20)
第五节 浪花文艺社 第六节 对数学的追补	
第七节 翻译	
第四章 大学	(28)
第八节 考大学 第九节 清华大学(一)	
第十节 清华大学(二) 第十一节 一二·九学	
生运动	
第五章 抗战(一)	(48)
第十二节 太原 第十三节 长沙 第十	
四节 离石 第十五节 柳林和王老婆山	
第六章 抗战(二)	(65)
第十六节 延安道上 第十七节 在西安	
第十八节 中条山下(一) 第十九节 中条山	
下(二)	

第七章 抗战(三)…………… (83)

- 第廿节 乾州中学 第廿一节 西安高
中·扶轮中学 第廿二节 雍兴工业职业学校

第八章 从中原到华北…………… (106)

- 第廿三节 河南大学 第廿四节 开封攻
城战 第廿五节 从中原到华北(一) 第
廿六节 从中原到华北(二) 第廿七节 从
中原到华北(三) 第廿八节 从中原到华北(四)

第九章 在华北大学…………… (125)

- 第廿九节 正定 第卅节 华北大学 第
卅一节 第四部 第卅二节 “逃情况”
第卅三节 跟成仿吾的冲突

一个既过五关、又走过麦城的人

- 记我所知道的张申府先生…………… (140)

记被《一二·九运动史要》说作是“右倾投降主义

- 者”的一伙人…………… (147)

从铮园到绿杨邨,再回到铮园

- 记我与徐中舒先生的几次接触…………… (154)

一个绝顶聪明但被扭曲了的人

- 为童书业逝世二十周年而作…………… (159)

由一个人的死引起的政治风波

- 回忆丁山先生…………… (168)

明史专家王崇武逝世40周年祭…………… (172)

记王瑶与冯契…………… (178)

死三人记…………… (183)

游美日记	(196)
------------	-------

附录：

我与俪生走过的路	高昭一 (223)
----------------	-----------

罄榷堂自叙

第一章 乡土和身世

第一节 乡 土

我姓赵，名甦。“甦”字所巾反，读莘。《诗·大雅·桑柔》有“甦甦其鹿”之句，《注疏》说，众多也；又说，聚貌。窥察父亲命名之意，也许是要我儿女众多；也许是要我事业昌盛、有所著述吧。字俪生，也是父亲起的，这也不过将“名”拆开来而已。有些朋友往往将单立人旁省掉，我很不喜欢。我 1917 年（民国六年丁巳）农历四月廿五日（阳历 6 月 14 日）出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景芝镇东村。安丘，是我的籍贯；景芝镇东村，是我的出生地，在这块地方我只住到十岁就离开了，所以我对乡土的感情不是多么浓厚。67 岁上回乡乘吉普车到处跑了几夭，再翻翻志书，才所知略多。

安丘，现在是潍坊市属下一个不大的县。它北邻潍县，南邻诸城，东邻高密，西邻临朐，东北邻昌邑，西北邻昌乐，东南邻莒县，西南邻沂水，八县环围，是山东半岛中部偏南的平原地区，以盛产小麦、黄豆、烟叶、高粱著称。郑板桥诗云“走遍青山是潍县，过了潍县又青山”，就是说，独独我们家乡一带缺乏山峦之

美。苏东坡从杭州调到密州(诸城),在文章里说“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这“桑麻之野”四个字,我认为是对我的故乡的最好的描写。不过,安丘虽无名山,但其西部邻近临朐一带,是有层层台地的。

《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 583),晋国派遣楚国的叛臣巫臣绕道到吴国去,路过渠丘,据说这是莒国属下的一个小封地,城池很破败,所以巫臣才有“城已恶矣”的话。这个小封地可能在偏南的地方,与后来的安丘城原本对不上号。可是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的,“渠丘”却成了安丘的古名。在考古发掘方面则有更远古的资料,自景芝镇西门外浯河崖上发掘到的黑陶高脚杯和白陶鬲是大汶口文化的最精品,至今展览在北京的国家级历史博物馆里,这就比公元前 583 年更早得多了。这说明,我们家乡在远古时候,是东夷人聚居繁衍的地方。

安丘的水,大体说是四条。头等河一条,叫潍水。从县的东沿自南而北,流到渤海里去了。潍水俗名淮河,“潍”音怎么与“淮”音发生误讹和沾连的,顾炎武在他的《读臯十事》中争辩过。二等河一条,叫汶水,自县的西南向东北流,入潍水。这是安丘县具有代表性的一条水,其与潍水交汇处是古斟郢、淳于、营陵(缘陵)、杞诸邦国的所在地或其附近地带,是一个古老的文化区。第三、四条水叫渠水和浯水,都流入潍水。我的出生地即在浯水之东。

安丘基本上没有山,但沂蒙山的最东余脉,却伸到了安丘的西部。沂蒙山对山东半岛来说,像一条脊梁骨,脊梁骨以北的水,向北流,脊梁骨以南的水,如沂水和沐水,则向南流。我的家乡,则恰好处在沂蒙山这个躺卧着的巨人头向西南脚向东北态势下伸出来的脚丫子底下。

至于政治区划,则历朝历代,情况十分复杂,一会儿划到了

这边，一会儿又划到了那边。以我来说，我把西汉划的郡国认为是最有权威的，它把安丘列在北海郡，缘陵是首县，安丘是次县；而南沿就是琅琊郡。试想，北海和琅琊是两个名郡，历来出了不少的人才。我以自己能在这两大名郡的边缘上出生而感到骄傲。

第二节 身 世

安丘巨族，首推张、马、曹、刘。有几句民语说，“张、马、曹、刘、赵、江、海、河、汉、尿”。试看人家把赵氏家族只不过比作一股尿水。当然，这也许是大族与大族间互相倾轧的一种诬蔑之辞。

这个家族来自河北枣强，这是有资料根据的。时间是元顺帝至正年间，公元 14 世纪中段距明朝开国为时已不远。他们在枣强，本是打铁户，可也偶尔有念书的，中了秀才，就放了山东安丘的县令。要在北宋初，进士们在翰苑中进修几年，才可以得到“权知某县事”的任命。元朝末年兵荒马乱，徐达的兵快打过来了，所以秀才也可做县官。此人叫赵太平，是我们的始祖。他在赴任途中，在今淄博市以东的金岭镇病故了，二世公据说会看风水，就扶柩将他老人家安葬在景芝镇保元门内。这地方，后人叫“老林埠”。土改中，凡有需执行死刑之赵姓男女，多于老林埠执行之，似寓有“厌胜”之意，就是说，让恶霸地主们到阴间里也祖祖孙孙不得翻身。

这个家族本来并不恶霸，是做豆油和白干酒生意的大商人地主。他们在胶州麻湾包有据说 300 只南船，将大篓大篓的豆油和白干酒运往海州，甚至扬州。这自然要发家致富。可是清

同治初年,阶级斗争激烈化了。捻军到了山东,剿捻的淮军也到了山东,传说捻军指挥官任化邦(任柱)和淮军指挥官刘铭传前后都曾驻扎在我们村里,指挥官就住在我家的高房里。阶级斗争一激化,官军不够用,就自然而然叫地主们组织“联庄会”,形成一个个土围子。地主们手里一旦掌握了一点兵权,恶霸的味道就自然而然地滋生了。我有一位叔曾祖父的神主楼子旁边就吊有龙头拐杖一只,说是刘铭传军门赏下来的。

可我们这一支系不搞武装,以读书科举为业,所以到我身上还能有一点积累下来的痕迹。我不认为遗传会起什么决定性的作用,但起一定的作用还是应该承认的吧。因此,在这里,我准备对我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伯外祖父和我父亲,作出一些描述。

曾祖父叫赵鹤立,是一个颇有毅力的人。他是大商人地主的过继儿子,“长毛”来了,将他父亲杀害,他在搏斗中也受有重伤。后来他考科举,秀才已经中了,但“书办”来索取贿金,他拒绝付给,“书办”们回去在卷子上挑个什么毛病:革掉了。报中和报革的两次报子都报到村里,我自幼就熟悉这段故事。他发奋走“捐班”道路,户部铨发他四川仁寿县知县,“书办”又来了,索贿 300 两,他不但拒绝,又打了人家耳光。“书办”们回去,将四川仁寿调成云南恩安。“万里云南”,亲友们都劝他莫去,他坚持去了,干了 12 年,从恩安县知县调镇南州知州,再调回昭通府知府,然后告老回家。

有一年在杭州大学,姜亮夫先生请吃饭,我问“您们云南可有个恩安县?”他说“你怎么知道有个恩安县的?这个建置早撤销了,它就是我们昭通府的附郭县。”我说,“家曾祖在同治年间当过恩安县知县署理昭通府知府。”他说:“哎呀呀,是我的父母官呀。”

又有一年去大理参观。去程在楚雄打尖,返程在南华打尖。在南华县招待所里招待我们的,是县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南华县清朝叫镇南州。我马上问“同治六、七年可有知州叫赵鹤立的?”他们说他们正修这一段,确有赵鹤立这么一位知州,山东安丘人,临去职老百姓还送了“万民伞”。我出到街上看看,这县座落在一片贫瘠的小壩子上,少数民族很多,汉民很少。

我这位曾祖公是一位遭遇坎坷时能够坚持挣扎的人。我在心里想:我是不是有一点他的遗传?

我的祖父是另外一种人。他叫赵尔璿,字晋玉。他考山东乡试,中式举人,进京当了一名内阁中书,长年在午门楼上缮写上谕、诏诰等文件。光绪十五年(1889)当了一次北闱乡试同考官。“红灯照”进京前一年,他46岁就死了。他死之年距我出生之年25年,我是他身后的幼孙,无由得知他的形貌和性情了。他留下十几大本日记,都是用铺子里的账本记的,记载他购进青铜器、甲骨、宋明人字画的项目、价款、来往有关的知会。账本我看到的也不全,当时分家风俗什么都要分,四吊子画每家一吊,十几本账每家三四本,我只能看“二份”的那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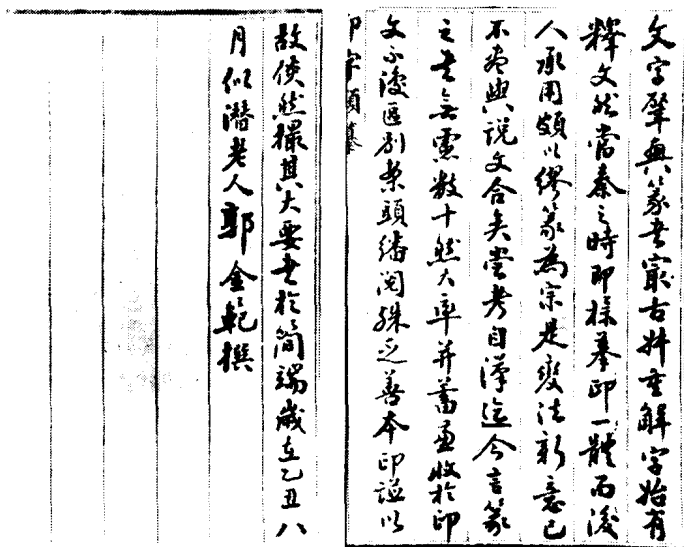
也曾和别人讨论过。有一次由乌鲁木齐乘车与周绍良先生同包厢,我问他,“一个内阁中书怎么有那么多钱买骨董字画?”他答,“我曾祖父周馥是两广总督,回北京每天黎明前要上朝时,先秤出300两银子(约合18斤多一点)一包的‘红包’若干包,去送科、房里的中书们。这不算行贿;只是委托中书们遇有重要上谕及早钞寄的一种预付的酬劳金而已。试想,全国多少巡抚总督,每人一包,买字画骨董不是满够了吗?”

可是这些珍藏,在运枢的途路上全部被窃劫了。父亲告诉我,从宣武门外住宅准备启行时,车户们请示太太,道路不靖,

箱笼轻重要有个区别。当时继祖母可能考虑到车户们与黑道多有勾连,问这话可能是探路的,于是回答说,“一个穷中书,有什么轻的重,不过一堆破烂罢了。”车过黄村,车尾绑箱粗绳被斩断,青铜器、字画于是荡然无存。呜呼!

我三、四十岁时,也曾一度迷于收购字画。我想:这是不是也受祖父的影响?

现在,该来说说我外祖父兄弟二人。哥哥叫郭金篆,字芝农;弟弟叫郭金范,字心亭。二人都是举人,都未再考会试。是诸城城内金家巷子的人。我赵家的曾祖和祖父没有著作,仅以仕宦传世;外祖父兄弟都有著作,所以带有学者的身份。67岁那年,我和我妻在诸城九曲巷(金家巷子故址)伫立一大阵,以表示对外祖家的怀念。在诸城博物馆找到两位外祖替别人著作写



外祖父郭金范(心亭)为人作序手迹

的《序》，而且是石印原迹，可以看到在书法上，大外祖写孙过庭，嫡外祖开始写颜、转学何绍基的。这和赵家不同，我祖父和父亲都从欧字写起，参些赵子昂，更接近“馆阁体”的要求。两位外祖父为人写序的书，都是关于文字学和篆刻学的，所以其中一种是由西湖西泠印社印行。这一带，是有这种传统，例如文字音韵学家许瀚（印林）和丁以此，就都是他们同时代邻县的日照人。

遇见一位与我同龄的老者赵子封，他是县政协的副主席，他对我说，他孩童时随他祖父去拜望郭大先生，未入门即遥闻丝竹管弦之声，原来大先生酷爱昆曲与京戏，家里经常有梨园中人前来演习，兼作相互间的观摩。传说京剧《击鼓骂曹》的道白和唱词，其初稿是郭大先生撰写的。二先生才华可能没有大先生那么大，他一生仅以教家馆为业，据说他教的学生考中进士的居多，故他的聘金较一般优厚一倍至数倍。晚年，他受聘我村替族伯赵孝陆（名录绩）做馆师，此家有地产 30 顷（即 3000 亩）。我父家贫，寄学此家，外祖赏识我父才华，就将其长女许配了，这就是我母亲与父亲相隔百余里能够结婚的机缘。

我平生爱写字，也喜欢看京剧与昆曲。有人告诉我，大外祖父身高一米八以上。做东昌府教谕时，他黎明前到资料室一条一条查阅、翻检资料。我心里想：我显然不就是他老人家的再版吗？

该说说我的父亲了。他叫赵录斌，字仲全，似乎是取“文武双全”的意思，其实他半点也不“武”，纯而又纯的“文”。古文功底很深，什么时候积累下的，他未曾谈过。据我推测，是在北京宣武门外法源寺做中书公的二少爷时在自己家馆、或寄学别人家馆时用功积累下来的。他中了秀才，补了廪生，清朝的科举就停止了。当时提倡赴日本留学，他堂兄弟 8 人，5 个去了，他不去。很早就沾染了鸦片烟嗜好，生活日渐疏懒，当中学堂教习要